

一九四八年

觀察

第五卷
第一回
珊瑚

獨立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 日八廿月八·年七十三

· 距出六期星遠 ·

第一期

第五卷



觀察通訊

觀察

信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張東蓀

特稿連載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

樊弘

金圓券能穩定物價嗎？

專論

論

韓國通信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

觀察特約記者

德國問題的癥結

The New Statesman

悼朱佩弦先生

吳晗

哀思

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晏陽初與中國農村建設

觀察特約記者

關於七五慘案最近的

報導(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一丘之路

文藝

匈牙利·B·易澳士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
地址，移轉社明定單
據，否則無從查覆退稿附郵
事如航掛退：附郵
後函詢：不易查覆通普售價：每冊二元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
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五元
半面五十五元月個六平寄：三元六角
香港：半平寄：二元
港幣十八元
港幣二元
美金二元
扣寄刊月個三平寄：一元八角
航掛：另加郵資
航掛：另加郵資
航掛：另加郵資訂閱價目
地址：上海九七二號(北四川
電話：(02)2422-590027

發行者：觀察社

編者報告

四卷出完後，社例休刊兩週，日子過得快，第五卷又開始了。現在把要報告的幾件事情，分述如左：

自五卷一期起，我們繼續舉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在第三卷本來辦過「華北航空版」，那是由北平的新實書店承辦的。新實書店那批朋友本來不是「書業」中出身的人，但有意思自己辦一點事業，俾使精神有所寄託。編者去年在平時，對於他們的印象不壞，所以信任他們，交由他們承辦。不幸他們始終不能履行契約上所規定的義務，以致拖欠的數目越來越大。我們爲了華北各地讀者的利益，不忍中途停止，所以勉強把第三卷出完，那時新實書店拖欠我們的數目，等於當時六七十令白報紙的數目。這個數目把現在的紙價一合，就要四十億左右了。他們一再說，負責到底，可是實際上，他們始終未能以事實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信譽；結欠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對此十分引憾。這次編者去平以前，有三方面來函和我們接洽承辦「華北航空版」。我們做人做事，素無成見，任何人都可以合作，祇要彼此負責，遵守信用。結果因爲和潘俠風君先談妥，所以即由潘君承辦。但關於「華北航空版」的一切賬目往還，都由潘君負責，與本社無涉。潘君除印行並推銷「觀察華北航空版」外，在行政系統上，和本社亦無任何關係。

半價定期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的，恐怕還有不少。業已收到的申請信件，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

觀察叢書

-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三版）
- 政學罪言（再版）
- 唯物史觀精義（四版）
-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
- 英人法國中國人（三版）
- 論雅俗共賞（再版）
- 鄉土重建（新出）
- 紅毛長談（新出）

小啓

（編者）

本期付印時，新制郵資，尙未公佈，本期封面上各項有關郵資，未克註明。我們希望本期出版時，新制郵資已公佈，讀者訂閱或購書時，即請參照郵局的新規定寄下為荷。

提高稿費（第十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九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二元至四元。

觀察叢書、觀察譯叢

「觀察叢書」已出十冊，「中國在戲盤上」即出，此次編者赴平，又約好了

十部叢書的稿子，連已有而未出的，共十四部。我們希望十月底能出一批，十二月底再出一批，書名和作者當於出版前再宣佈。除了「觀察叢書」外，另擬再出一系「觀察譯叢」。「觀察譯叢」選書的原則，仍以「價值」和「重量」爲第一，籍以符合「觀察社」的一貫風格。第一批四冊業已選定，並開始翻譯。但因本社創辦不過兩年，規模很小，出書能力受有限制，所以譯叢的出版，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實現。

最近幣制改幣，採用金圓券。我們報告三點如左：

- 由於過去物價的過度波動，業務上受到許多苦痛，特別是叢書的購買，得罪許多讀者，其詳已見第四卷報告書中。
- 現在我們已將所出叢書，改用新標價，希望此後讀者來函購買時，由於書價的不致時時調整，可以避免「來款不足謹請補寄」的情形，這樣，在讀者，在我們，雙方都可比較方便。
- 因爲假定物價暫時可以沒有太大的波動，所以自即日起，恢復接受六個月的定閱，價目請閱封面。

3. 由於美元和金圓有明確的比率，自即日起，國外訂閱半年者，一律改收美金二元（原爲四元）。

致謝

在這休刊的兩週中，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是熱情鼓勵我們的，對於這種鼓勵，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並願向讀者保證：我們一定像過去兩年一樣，繼續努力下去。有的是向我們建議指導的，我們對於這些建議指導，願意盡量接受考慮。編者精力有限，未克一一迴復，特在此處向惠函賜教的讀者先生致誠懇的謝意。

清寒讀者來函登記定閱半價本的，已逾千名，但遠地讀者的信件，正在途中的，恐怕還有不少。業已收到的申請信件，我們已一一審查完畢，分別通知，希望合格的讀者如期匯款來訂，以便寄刊。以後

收到的也當隨時審查函復，以迄額滿爲止。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的，凡是華北各地讀者來函申請的，如註明平寄的，我們一律請他們就近向北平訂購「華北航空版」。因爲航空郵資的負擔太重，舉辦「半價本」的目的本在減輕讀者的負擔，假如由上海用航空寄去，反而比在華北訂購「華北航空版」爲貴，這就有違我們體貼清寒讀者的原意了。

我們因爲六七月中物價跳得太利害，爲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將篇幅自二十面減爲十六面。嗣後即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不贊成。編者因在四卷報告書中請求讀者，特別是後方的讀者，表示意見，以供參考。現在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大都要恢復二十面。其中有幾位特別強調，說他們都是「窮光蛋」，但願意加重負擔，不願減少篇幅。有四位北平讀者聯名來信，這樣說：「我們爲什麼愛讀觀察？爲的是它內容充實，不是爲它價錢便宜；以四卷二十二期定價論，每份二十萬毫，在北平等於兩個燒餅的價值，一千公尺距離的三輪車價，半張普通電影票，荀慧生的戲票價五分之一……；我們的意思，兩個燒餅不瘦一飽，一個星期撙節兩個燒餅，不會影響健康；一次普通電影片子所得的印象僅是哥哥姊姊，鴛鴦蝴蝶，比從『觀察』所得的實益，相差遠甚。一個刊物能否吸

引讀者，在乎內容是否充實，不在乎售價的貴賤。……編者先生處處顧及讀者的負擔，自是正確的；但爲減輕讀者的負擔而至於減縮頁數，限制篇幅，因而連帶影響刊物的內容，我們是反對的。請編者先生不要誤會我們是富裕階級，實在我們都是低級公務員，要獨立支持全家的生活！既然愛好『觀察』，雖然負擔重些，還有什麼說的？我們並且還響應編者良心呼籲，放棄了定閱半價本的意思呢！」蘭州有二十幾位讀者都希望至少維持三十面的頁數。此外四川廣東等地的讀者也都有信來。現在我們就出二十面，假如以後情形有變化，再臨時斟酌是否減少。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在物價上漲的狀態下，人人無不希望政府所發行的新幣，金元券，能够穩定物價，但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便能穩定物價呢？

政府所發行的金元券是否能够穩定物價，要看金元券是否能夠根治物價上漲的原因，那麼金元券便將能有穩定物價的功效。如果不能，那麼物價便將繼續往上飛漲，而不聽政府的命令了。但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呢？

誰都知道，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外在一定的時間裏面，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大於物資供應的增加。試問金元券發行之後，是否能使搶購物資的貨幣的增加相對的減少呢？這個便要看金元券的發行數量將來是否還要繼續的增加，同時，並要看金元券發行之後，在每一時間裏面，它出來買貨的次數是否還要繼續增加。在他方面，並要看每一時間裏面物資的供應是否會因金元券的發行而增加。須知他們究竟是否增加或減少，都絕對不由政府的威力決定，而係由現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經濟的因素決定。何以說物價上漲的因素絕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猶記在三十一年的時候，政府曾用拋售美金儲蓄券的辦法來平抑物價，到了三十二年時兩億美金儲蓄券都拋售完了，但物價平抑了沒有？後來政府因見拋售美金儲蓄券的方法不行，改用拋售黃金的辦法，共耗費價值二億美元的黃金（約五百七十萬兩）用來平抑物價，但物價平抑了麼？在三十三年八月政府眼見拋售黃金的政策又失敗了，再採用黃金存款的辦法來平抑物價，但平抑了沒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異想天開，頒布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由拋售黃金和拋售美金儲蓄券的平抑物價的政策，轉而採用取締黃金買賣和禁止外幣流通的方法，結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見，在過去六年之內，單憑政府的一紙命令的威嚴必是不能够平抑物價的了。過去不說了，但問，現在怎麼樣呢？

驟看起來，政府現在決然放棄法幣而採用金元券貨幣而名之曰金元券，它是何等值價的東西，必比銀元要高貴得多。在抗戰以前，銀元比金元不如，尚可相對的平抑物價，何況金元呢？而且依據政府的金元券發行辦法第一條，金元券每元之法定含金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二七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條金圓券之發行採十足準備，前項發行準備中，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之國有事業資產充之。這點明白表示金元券是有十足的準備金的。因為政府既然規定每發一張金元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銀與美鈔和六角的政府資產，那末，在政府的金銀美鈔與國營的資產無法增加以前，便當絕對不會增加發行，而物價便將穩定了。可是，我們假如略一反審，立即便可明白，這種想法是大錯的。

於此筆者應該特別強調，即金元券的發行是絕對用不着準備金的。金元券既不能自由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且不許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流通、買賣或持有，那麼，拿這筆黃金美鈔白銀存在那裏做什麼？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並不許移作別用，這豈不是把國家的資源來濫費麼？凡有銀行學的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用作發行金圓券的黃金美鈔和白銀是絕對不可以移作別用的。移作別用便是犯法。並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否則，便是犯法。因為政府的法令既然規定金元券的發行必須有百分之一元的現金兌換金元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兌換它，那麼，經此兌換之後，其他的金元券的百分之四十的現金發行準備，便不足了。不足便是違法，欲不違法便須一元也不能用以兌換金元券，所以這筆現金的準備不但不能移作別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移作兌換金元券之用，即根本沒有用。現金的準備既然存在那裏根本沒有用，然而却又必須存在那裏作幌子，這豈不是資源的濫費麼？特別的是在中國如此需要外幣黃金與白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的今日，即以現存的全部的金銀和美鈔來購買外國貨尚還不足，而須有待於美國的貸款。今更把此有限的黃金、白銀和美鈔拿出一部份來作發行的準備，由急用化為無用，這

本期作者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吳哈：清華大學教授



豈不是資源的濫費是什麼？

誰都知道，金元券的購買力或價值，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是與金元券的發行額為相反方向的運動的。假令貨物的供應沒有增加，或信用的狀態沒有變遷，金元券的價值且將與它的數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貨物兩個錢買與一個錢買，在兩個錢買的時候物價便是兩元，在一個錢買的時候便是一元。一物而賣兩元比較一物而賣一元是錢的價值低落一半，這豈不是金元券增加一倍，它的價值便低落一半麼？反之，如果發行減少一倍，金元券的價值便當增加一倍。金元券的價值既然與其發行的數量成反比例，那麼，為提高金元券的價值起見，政府只要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現金準備做什麼？現金準備既不可以作來作發現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別用，我們何必要用它呢？「割鷄焉用牛刀」，減少發行金元券儘可不必一定要用黃金美鈔和白銀來作準備。

然則為什麼政府不叫印鈔機少轉動幾次呢？亦就是說，政府為什麼不信賴政府自己，偏要信賴黃金、美鈔與白銀呢？是不是說，由黃金美鈔與白銀所作成的發行準備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貨膨脹麼？須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來維繫。在收入不敷支出之際，除了向人民負債之外，就只有發鈔之一法。任何發行的準備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際，靜聽讓政府的官員餓死以圖維持金準備麼？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國發鈔的金準備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國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幣仍然維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銀佔百分之二十五，外國貨幣佔百分之三五，合為百分之六〇。法幣的現金準備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幣的增發，百分之四〇，行麼？除了政府的國庫的開支能以稅收與公債來彌補外，單憑現金準備的比例，是絕對不足以阻止金元券不再繼續增發的！

金元券的現金準備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證通貨的膨脹不繼續，或不足以阻止物價的飛昇，然則它是否可以延緩貨幣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減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價亦當不漲。可是這又要看金元券是否可以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現在一般人民的心裏不相信紙，而相信金。金元券不但不能兌換金，且要收拾市面的存金，他不但不是紙，而且比紙更壞，試問人民如何能够把它拿來作為保存價值的工具呢？似此，則是人民對於金元券還是不把它當作金元券，而把它當成一種闊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則在金元券發行之後，人民還

是不欲保存金元券而要保存貨物，結果金元券的流通速度，勢不能夠減少。金元券的發行的數量，既不能因十足的發行準備而減少，且亦不能因為它而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則金元券的發行條例又有什麼理由使物價不再上升呢？固然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則四元金元券可以兌換美鈔一元。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法幣不是亦可以兌換美圓的嗎？法幣，在政府的允許之下，亦是可以兌換美圓的，金元券亦須在政府的同樣允許之下，始能兌換美元。金元券兌換美圓的能力，既不比法幣高，我們似亦看不出金元券的價值為什麼要比法幣更高。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考慮第三個問題了。即金元券發行之後，物資的供應是否能增加。在內戰的烽火到處瀰漫的今天，國內生產的物資必是無法增加的。如欲物資有增加，單看外貨的傾銷的程度怎麼樣？且看外貨輸入的程度是否能抵得上國貨減少的程度。這更要看中國人在國外的外匯存款或其他的資產是否能夠因為政府一紙的法令，趕快便把他們來買貨物輸入到中國內地來。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輸入，而且他們恐亦不願以他們的外國資產來換成金元券或債券。由此可見，這一條路亦是很渺茫的！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政府發行金元券的能力。依據金圓券發行辦法第九條，金元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我們可以假定現在法幣總額約為二百萬億元。一元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二百萬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便收回來了。二十萬億中除了六億點七，尚餘十三億點三的金元券發行的能力。這即是說，政府如欲收回現存的法幣只要發行六億點七的金元券就行了。在物資未增加，和美匯黃金與白銀均極感缺乏之時，政府如欲穩定物價我看六億點七已就足夠了。其餘的十三億點四的金元券，莫說十三億點三，連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則政府又何必規定廿億金元券為發行的最高額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金元券是否能夠穩定物價仍須視政府國庫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足夠以符支出，和國內物資的生產是否能够增加以為斷。單靠金元券的發行辦法本身，是不足以有為的啊？但政府的收入與公債是否能維持支出呢？正如財政部長王雲五先生所說，「在歲入方面，固有賴立法院之支持，與各方之努力，在歲出方面，便須政府各部門充分合作，尤以軍費開支，佔歲出之最大部份，當特別審實與節約。」這當然都是最要緊的。

民卅七、八、廿。於北京大學

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

費孝通

觀

晏陽初先生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社記者「縱談復興我國農村問題」，接着又發表「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這裏宣布了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值得關心農村工作的人士詳細檢討的。

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

們和晏先生是相同的。晏先生對這現象的診斷是：「他們受了封建傳統的壓迫，以及外來強權的欺凌。」這個診斷我們也認為正確的。晏先生希望「把蘊藏在中國廣大鄉村中偉大磅礴的力量——民力——開發出來。」這個目標我們也是同情的。

根據晏先生的診斷去制定工作綱領，應當是怎樣去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怎樣去抵抗外來強權的欺凌。晏先生是反對「空洞的口號和標語」的，這一點我個人更是贊同，所以我們得更進一步具體的說出：什麼是封建傳統？這封建傳統怎樣壓迫農民？誰是外來的強權？這些強權為什麼要欺凌中國農民？怎樣欺凌法？除非把這些問題具體的分析出來，我們才能避免自己犯了「空洞口號和標語」的弊病。

晏先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極簡略的。他說：「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產的是農民，流血抗戰的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即是在這簡略的回答裏，我們可以說晏先生也注意到租、糧、徵、派。租、糧、徵、派是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壓迫欺凌的手段，結果是中國農民負擔的重大，使農民血汗流盡，生活痛苦。

如果我們分析下去，就該問：誰在徵派租糧？向農民徵派出來的租糧給了誰？作什麼用？這些吸收農民血汗的人憑什麼力量能這樣向農民徵派？什麼人和什麼外來強權在支持這種力量？——這些問題晏先生並沒有答覆，非但沒有答覆而且提出了另一套理論出來，把這些問題劈開了。——這裏我們和晏先生的看法開始分歧了。

讓我們先看晏先生的文章是怎樣做下去的。他說：「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凡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無不包括在內，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纔不至架空。」——以上所指的祇是空洞的原則，自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並沒有跳出口號和標語的範疇——「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健衛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纔能稱作『自力』，有了『自力』纔能作到『再生』！」

這篇富於口號魔力的文章，骨子裏，至少由我讀來，是把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歸罪於中國農民的自己沒有出息，咎由自取。這種要農民引咎的理論是和晏先生幾十年來一貫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貫的看法是中國農民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喜歡對稱筆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識、生產、健康、組織」四個口號。現在主持執行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晏先生還是二十年前主持定縣實驗區的晏先生。「封建傳統和外來強權」的診斷到他真的要說到工作

綱領時已被置諸腦後了。從書本上學來的名詞確是不會生根的。

自覺的教育是現實的生活

我們要瞭解晏先生的基本理論，不能不提到他對於「教育」的看法。晏先生一生事業的中心是他的「平民教育」。不論他今後會做什麼事，他在平民教育上的貢獻是不應當抹煞的。但是如果晏先生願意聽我們的批評，我也願意很坦白的說，他的貢獻是偏重在教育的技術，尤其是文字教育的技術。他對於「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他的立場，我想說，他是以傳教精神去瞭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是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着手「教育」：以知識去愚，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我在此並不想討論中國農民是否有此四大病症，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教育者的態度。在我看來，教育並不是以「有」給「無」，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個能發展個性的環境。我這種看法裏承認每個人有他判斷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態度是在尊重人性。這話和晏先生「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主」的半句是相反的，但是如果承認這一點，接下來應該說：農民是有自覺的，我們教育者的責任是在幫他們排除障礙實現他們自發的求生活動。這和晏先生下半句「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的兩個「使」字不同。這一點不同出於我們對「教育」意義認識的差異，因之也使我們對整個農村問題的對策有別了。

我實在並不能同意晏先生認為中國農民到現在還沒有「自覺」。我這樣說並不是從「鑽研中西書籍」中得來的結論，而是我實地觀察的結果。最近暑假裏我還到鄉間去訪問過，就是十幾歲的孩子都能回答你，他們生活為什麼這樣苦的。他們的大哥給政府拉去當兵了，家裏缺乏勞力；他們田裏收來的麥子，自己吃不到，給保公所拿走了；他們被趕到門外，把房子讓給軍隊來住；到了秋天，借了債去回地租——這一切都是現實的經驗。當我偕同一些同學去替農家打D.D.T.時，他們很感激我們，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當晚是否能睡在沒有臭蟲的坑上。這套現實的教訓中，他們還會不覺悟麼？還得靠識幾個字才能知道他們自救的道路麼？我願意晏先生回頭問問自己派到鄉村裏去教書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否已從農民給他們的教育中懷疑了自己工作的用處。

晏先生自己是主張不要在中西書籍鑽研出結論來的，他怎麼會這樣相信他們的千字課呢？是不是因為晏先生先假定了鄉下人是「愚」了之後，才覺得他們還得鑽研一下書籍才會自覺麼？——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晏先生的千字課的價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並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後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

經自覺的不單是要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

暑假裏我參加了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營，我的目的是要實地看看在現在這種局面下有什麼可以服務的。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己想虛心的向熱心服務的朋友們學習。其中有一項工作是識字班。但是問題發生了，我們應當用什麼教材呢？在實際工作中才會明瞭人不會「爲識字而識字的」。識什麼字？看什麼書？如果依晏先生的說法，我們得「使農民覺悟起來」，所謂覺悟，依晏先生上文讀下來，應當是「使」他們認識現在的租、糧、徵、派的不合理，「使」他們認識封建傳統的壓迫，外來強權的欺凌。如果這樣做，晏先生能保證這些熱心的農村服務者不帶上紅帽子，不關在特種法院裏，不致連性命都丟了麼？如果不從文字裏去增加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試問教些什麼呢？花呀草呀地認識幾個字，有什麼用處？農民爲什麼要每天費上幾個鐘頭來識字呢？這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問題。沒有一個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會瞎了眼看不到現在農民所遭遇的嚴重壓迫，但是晏先生所主持的中美復興農村委員會能有勇氣面對這問題麼？晏先生呼籲知識青年來合作，爲農村服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是如果晏先生要逃避這基本的解除壓迫的問題，是否能滿足熱心服務農村的青年呢？晏先生不能回答這問題，他整個計畫也會「架空」的。

取消土革的農復方案

問題還是回到了，如果要避免解除封建傳統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欺凌，是否能談得到農村復興。晏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的」。他說：「這條路，今日也許有些人以爲緩不濟急，他們認爲目前最迫切的是解決饑餓、物價、戰爭種種現實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今日最嚴重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三十年前，當鄉村建設工作發動時，何嘗沒有人認爲現實問題是戰亂、災荒、窮困等？何嘗不以爲此種鄉建工作是太緩不濟急？這種被批評爲緩不濟急的工作一天不動手推行就更多遲緩一天，而一切現實問題仍將存在。說『迂緩』並不能否定這條路可走。捨此別無二途，更無捷徑。」

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說得更清楚：「改革土地制度，自屬重要，惟此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意思是農復會不能做這件事。

根據這兩位負責人的聲明，農復會是想避免社會制度的改革而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的。晏先生所提出來的理由很值得懷疑。他首先把饑餓、物價、戰爭作為現實問題是以現象代替了問題，因之忽視了造成這些現象的當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三十年前的事來作爲不必從這基本問題下手的理由。這如果能成爲理由的話，必須是晏先生在過去三十年的做法確實解決了農村問題。事實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是認爲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却說明定縣路線並沒有解決農村問題。

在我看來，定縣實驗最大的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去謀改革。晏先生並沒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麼缺點，而且願意把定縣的成績作爲「迂緩」路線的保證，這不能不使人失望了。

爲什麼不從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這一個問題在我的「鄉土重建」一書裏已經有過答覆。簡單說來，在農民的負擔中，地租是一個重要項目。過去幾年的內戰主要關鍵，在我看來，也就發生於土地制度的爭執上。農民業已自覺，要求改革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階層硬是要維持這特權，不從國家全體利益打算，而從階級利益着眼。和平方法既不能解決問題，結果引起戰爭。戰爭又增加了農民負擔，徵派跟着一層層加上農民肩頭，反抗的勢力更加擴大，造成晏先生所謂「他們汗流浹的一天，他們血有流盡的一日」了。晏先生所指出的封建傳統在社會制度上說，除了這種剝削性的土地制度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能是什麼呢？

在農民負擔這樣重，生活這樣苦的現況下，識字、生產技術、衛生等一類工作是不發生多大作用的。以生產技術來說，我在北平附近一個素以菜蔬出名的村子裏訪問過，現在瓜果蔬菜等一類作物都已不敢種，種了也收不着，軍隊過境，比蝗蟲更兇。時間還不過半年，而政府的徵收已經超過了全部收穫的三分之一。農民買不起肥料，看老玉米瘦得可憐。晏先生可以說，他們缺肥料我們送給他們，但是在農民看來是這又何必呢？既是要拿走的，過一道手，有什么意思？這不能說是「迂緩」，而實在是「迂闊」，事實上還在吸血，輸血有什麼效果呢？吸和輸之間的差額這樣大，如果要「倒下來的」，還是扶不起的我並不相信晏先生看不到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他可以認爲這至少是「爲老百姓做點起碼的基本的實際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可以說他並沒有反對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如蔣夢麟先生所謂「非政府全力全面實行不可」。但是事實上是怎樣呢？美國拿這筆錢出來的目的是和軍事援華相配合的，就是打擊共產黨。共產黨實行了土地改革，美國就得另外想一個方案來對抗土地改革，那就是「復興農村」方案。所以並不一定是晏先生喜歡迂緩路線，而是美援的來源注定了他不得不避開已被共產黨搶去的土地改革。

過去半年來國民黨裏面也有高唱土地改革的，我們先不必問他們的動機如何，但是表面上看來至少可以說因共產黨的壓迫，不能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而且回頭看看三民主義，內容裏本來也有這一個方案。有些地方，爲了軍事需要，也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正在想學共產黨的辦法推行土革，雖則我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能收到效果，但是比了否定土地問題是進一步。這一種趨勢到農復會的成立又打住了。晏先生的迂緩路線如果是代表中美同意的中國農村政策，那是可以說一種倒退的步驟。

我並不願意從政治立場上去批評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應當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資格，爲社會服務，能做多少就可以說是他的貢獻，批評者必須從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應當從他沒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現在他的任務是代表政府去實行農村政策。他就得負這政策的責任；如果這個政策並

不能復興農村，反而避重就輕，以慈善家的救濟態度來拖延農村問題的解決，他將因這政策的錯誤而受到指責。個人方面我們儘管可以同情晏先生「含着眼淚」，但是爲了「中國的安危」不能不坦白的檢討這種政策的過失。

晏先生自己明白在這個局面裏，他的教育方案是很難見效的。他希望「各方面共體時艱，捐棄成見，轉陰霾爲光明，化暴戾爲祥和，都站在爲人民謀福利的立場上，以工作成績相競賽。那時，民力纔能發揚，民主纔能實現。」事實上確是如此，晏先生的鄉建工作是技術性的，當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解開了，他現在所提倡的四項工作，知識、生產、健康、組織，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是開發民力所需要的技術。但是晏先生三十年來實地工作的經驗並沒有「覺悟」這些技術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條件，那就是沒有封建傳統壓迫和沒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上)

張東蓀

本書寫後，覺得還有補充的必要。在序上會說，本書是在授課時期寫的，往往上課把思路打斷。有許多意思本來想就要說，却因爲思路遮斷，以至忘了。後來亦沒有追補進入。現在遂覺得應該補充的地方實在不少。乃決定做「此補義」。

§一 在書中曾提出一個意思：即人類有提高其物質生活的要求。詳言之，即對於物質生活有不斷增進其幸福的要求。舉一極淺的例子，如走路總得慢而費力，遂發明坐車。車又嫌慢，乃發明飛機。又如吃東西，拾天生的果實不及人種的黍稻來得滋養。凡此種種都是證明人類對於其資生之具的物品總不免要想愈增愈充足愈美滿則愈好些。並不是一個人如此，乃確是人人都如此。不過自有人類以來，却從未辦到這樣普遍提高的境界。在君主的國家，只有君主的物質生活最優裕，而其人民中却有衣不暖，食不飽的。大家都是一人，人性總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辦到所得最豐裕的物質生活，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抗的隱伏性趨勢。這個趨勢把人類的歷史向前推動了。人類的歷史所以有計劃的變化乃是全靠着這個推動力。因爲這樣的普遍向着物質生活充裕與提高而進的要求正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人都如此，所以其來也不可抗拒，正好像洪水一樣，一直冲下去。

這種理論當然可以說是「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之一種。這一類的經濟決定論只是主張普遍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推動文化前進的決定性。乃只是就歷史的整個前進歷程而言。却與任何個人沒有密切關係。所決定的意思在內。現在有一些論者主張查看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只須查看其所屬的階級。以爲階級決定人的一切。這種的階級決定論固然亦是經濟決定論之一種，但和我所主張的上述理論完全不同。事實上，我們翻開社會主義運動

有外來強權欺凌的局面。晏先生悲天憫人的看法是發生在低估了中國農民自動發自發的革命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從文字知識裏得來的，而是從求生的本能中發生的。如果晏先生從過去的實驗中認識了這一點，他可以繼續他私人的事業，用他的專長，從技術問題上多作實驗，有一天，他所貢獻的技術還是可以有益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的。但是他沒有這種認識，終於牽入了政治性的渦渦裏去。歸根我不能不覺得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診斷缺乏真正的信念。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在這時局動盪，歷史轉換的當口，他又接受了一個更大的考驗。如果他真是一個發達科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如果失敗，他應當有勇氣承受這考驗的教訓，不應再像在過去三十年一般的在實驗中失去自我教育的機會了。

史必見社會主義的大師們百分中有九十以上是不出身於勞動階級的。同時如美國，有些勞動者因爲分潤得一些好處乃反而偏向資本主義。所以這種階級決定論的經濟決定論已早爲事實所反證了。著者堅決主張只有我說的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是可能成立的。倘若把範圍放得太寬，把話說得太呆，則不爲真理所許。所謂在歷史前進上有推動力的決定性是指歷史上的變化而言。歷史是變化的，好像水流一樣。但却有階級性。每一個階段有其文化的特徵。由甲階段到乙階段的歷程在當時好像是突變，而在其前却乃有漸變爲其預備。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漸變與突變同流，既不是只有突變亦不是只有漸變。

但突變只是限於社會的生產力被生產的社會關係所桎梏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原有的生產力不能再發展了，必須把封塞這個生產力的社會關係打破了，方會再發展下去。打破這樣的阻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即是革命。革命是突變，而在革命以前却有漸變。漸變就是養成這樣突變局勢的種種條件。因爲這些條件不是一天能造成的。條件且有種種不同，有物質上的，有社會關係上的，有政治機構上的，有含有國際性的，有人事上的，亦還有屬於思想文化上的。同時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反面的條件亦居同等重要地位。條件的成熟亦各有差池。然無論如何必須經過一個各條件自己造成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一個條件本身在那裏變。此即所謂漸變是也，亦即所謂突變之預備是也。

§二、「阻塞生產力的再發展」與「枯竭了生產力」，這些言語雖已爲現時論壇上的流行話，然而我仍相信很少有人真了解其中的意義。原來生產的推動是靠着兩個因素。一個是屬於智力的，同時又是物質的。另一個是屬於社會關係的，同時亦是在分配方面的。質言之，即一個是生產工具的新發明，即有

新工具出現；另一個却是資本，即資本在社會關係上的功用。關於第一點，新生產工具的發明與出現是以下列三個標準而定，即生產量的增速與增多，產品的增精與所費人力的減少。達到這三個目的則愈發明新的生產機器愈好。不過這件事在本身雖只是人類智力的努力，然却須有社會關係的適當環境相配合方會出現。這便連接到第二因素，其實二者是絕對不可分的。即必須二者會合方成功。但事實上有時二者却有分開的情形。

我們先講第二因素，然後再論到其他。這就是人類勞作的獲得之堆積。普通名之曰資本。但不限定爲資本制度的社會中的「資本」(Capital)。所以英文又有一個字是「Socia」。現在我們即取這樣廣義的意思。凡人類勞作的獲得如果能厚積起來，用作再生產的幫助，則都可名之爲資本。一個人羣之富力就看這樣的資本有多少。社會學家把它名之爲「社會的積餘」(social surplus)。文化學術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而在物質方面則是資本，資本愈厚積則這一個民族愈富。所以資本主義可以被攻擊，而資本却只是寶貝，不會是壞東西。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由於資本屬於少數人，不歸全社會。並不能罪及資本其物的本身。這常識我願青年們不可不記在心上。老實說，一部人類經濟史正只是資本發展的變遷史。在上文已說過，人類爲了要增加生產，乃作發明新工具的努力。這是人對物的關係，却同時必有人對人的關係，就因爲人類的勞作總是與人合作，而不能是一個人來做。這樣的人與人的關係遂把人對物的關係加以限制。我在中建半月刊上曾對於這一點有下列的說明：

「爲甚麼生產情形會演變到無法再增的地步呢？這並不由於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出現。即使有了新的生產機器，而仍有不能普遍被採用的可能。試以土地的生產爲一例而言。土地要想加增其出產量，必須改用機器來耕種與播種。但農民以其所獲除了交付地主與納稅外，已早無多，衣食尚處不足，安有餘錢來購買機器呢？這便是把農民勞作收穫上的餘剩價值都被地主們做爲純粹的消費而浪擲了。倘使能把這一部分交納於地主的保留厚積起來，用以換得機器，則土地上的出產必可增加其數量。所以土地改革上廢除地主階級一事，其目的只在於要使一部分勞動價值保留爲再生產之用，不讓它浪費了去。並不是專爲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尤其不是爲了報復或出氣。」

在這一段話中表明社會演變中往往初期是助長生產的，後來却會變爲阻礙生產的了。地主的發生亦就是一個例。全部經濟發展史都建立於這個原則。由遊牧進於農業就是因爲農業的生產比遊牧高。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下去亦就是因爲那種經濟制度不能再使生產提高。而人類却有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這個要求乃得把遊牧變爲農業。同時在政治亦把公社變爲封建。所以封建的初起是對於生產有幫助的。迨到後來却變爲阻礙生產的一種制度了。資本主義之功亦就在於其初起時能打破封建。就因爲封建到了後來變爲機械生產力的制度，人們乃自然而然歡喜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初期確能把生產力做進一步的推展，

使人民大家生活水準較在封建時代爲高。所以我說，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歷史變化的推動力。在農業生活下的人決不願再回到游牧生活；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成立後的生活下，人們亦決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些都是極淺而易見的。問題是在發展到何程度方會梏械了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情形，則比較容易說，就是集中財富在幾個少數人手裏。其實封建的情形亦何不是如此。只要財富愈集中，則每個人的生產力都被剝削了。其結果只有侈奢與浪費，而對於再生產便起了阻礙。這種情形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來妄加評斷。這種客觀情勢既存在了，其內部自然包含着革命的要求。有了革命的要求，便在那兒醞釀着革命。正在醞釀革命，則一遇適當時機自然爆發出來。所以社會革命是和婦女生小孩子一樣，必須先懷孕，且必須在腹內長足，一旦瓜熟蒂落，即呱呱墮地了。不過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運動者總不免於性急，他們雖亦說必須客觀條件成熟，但他們依然是以主觀的判斷爲準。其結果及只有用「碰試法」(trial and error)，因此歷史上社會革命反以失敗的居多。就是由於主其事者總自以爲客觀條件已成熟了，可以試一試看。其實這種試一試看的辦法是十二分危險的。最能給反對者以口實亦就是在此。因爲徒事更張而無補於實際。即徒然紛更而對於生產增加的要求依然不能達到。其結果甚且會激起反動。所以才有一改良派出來以反對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其實苟能真適合於客觀情勢的需要，革命還是不可反對的。我敢說，真正了解歷史的人是不會反對革命的，所反對者只是某種作風的生吞活剝而已。

§ 3、所謂成功的革命與失敗的革命之區別就在於一個確是冲開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的梏械或阻礙，而另一個却只是社會關係變化一下，並不能真把再進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先講前者。須知生產的增加係指全民族生產總量而言。須知稍一不慎，反會把生產總量降低。這是一個最可怕的事。所以使生產總量增加却是一個艱鉅的工作。在革命時只能開其端，而其後必須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的當時是做不了的。不過良好的開端却十分要緊。倘使開端不慎，種下了惡果，則必定仍歸於走上失敗之途。詳論此點，請俟下文。

現在我們注重的還是在那個失敗的革命。因爲歷史上確是失敗的革命較成功的革命爲多。尤其在我們中國。我們不能不大加警惕。中國人舊時於革命謂之換朝代。我們如果要把換朝代與革命嚴加區別，則可說前者就是失敗的革命。失敗與成功以何爲標準呢？亦就不外乎看它能不能解除生產力的梏械，致使一班生活水準提高。所以換朝代與革命只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中國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長久的了。但其中却有許多次的這樣換朝代式的革命。每一次換朝代幾乎有一個公式：就是俗話所說的官逼民反，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本身腐敗到萬分，同時對於老百姓又榨壓無微不至。於是乃逼得造成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又因這個新興的集團，其作風比較良好。老百姓是沒有主動的，他們只知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新起的統治集團就根據這一點把舊有的統治集團打倒。舊的統治集團雖終被打倒，然而中間却經過

一個互相殘殺的期間。有時且這樣的期間經過相當長，有數十年之久。在這個互相殘殺的時候，老百姓在左右夾攻之下，死亡無算。人口過衆問題就在這裏得到一個自然的解決。所以新立的朝代得相安一時，却並非由於冲破了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社會關係，乃是因為人口減少，在經濟結構無變化的狀態下亦能不生太大的問題。（平心而論，即在社會改革以後，人口並不是就沒有問題了。所以同時在人口方面想一個限制過度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無必要的。俄國情形與中國不同。俄國無人口過密的情形，自不須主張限制。不過單就人口一端來說，似乎太偏，而一口咬定人口不成問題，亦未免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屢次排演的戲劇。須知排演這樣的醜劇只有在閉關時代不與外邊文化較高的民族相接觸。一旦閉關不能再閉下去，如果仍如此排演，則斷難競存於世界。所以今後中國的任務乃是如何設法使這樣的醜劇絕迹，不再重演。這不是歷史換新頁，乃直是歷史翻身。亦就是著者所贊倡導的一次革命論，以打破這個週期革命的事實。即主張一度革命以後，永不再有內戰。

大韓民國李氏王朝（漢城通訊）

爲甚麼中國會屢屢排演這樣換朝代的戲劇呢？這却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的人們之一重要課題。問題的中心是在何以革命者一旦取得政權以後，長則至多不過百年（中國歷史沒有百年以上的時間沒有內戰），短則僅有數年。終會自己變爲革命的對象，叫別人起來把他革掉？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也很容易：就是因爲沒有把生產力再發展的潛能放開來。至於何以不能如此，却又由於中國社會有一個特性，這或許是中國根本上的一種悲哀了。須知一個社會雖內部已經醞釀了革命在那兒，却仍須有人以從事於革命。這些從事於革命的人須要有一種性格，姑且名之曰革命家的性格，或反抗性。中國老百姓却是十二分有忍耐性，實在不會反抗。有反抗性的人只限於一些籍此求出路的。這些求出路的人是有遊離性。他們本來向舊有的統治集團中鑽營進去。倘使鑽不進去，便改爲向新興的方面進攻。而革命者如想招兵買馬，只有在這些人身打主意。因爲普通的老百姓是不革命的。這裏很顯出中國社會的特質，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之。

觀察特約記者

朝鮮在美、蘇、中三國的影響下，政治的主流却只有兩個：（一）是統一政府的路；（二）是單獨政府的路。

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南的南韓。在蘇聯參加國際共產黨活動的和在中國參加左翼抗日集團的韓國人士，就多集中在三十八度以北的北韓，在南韓作着地下活動。只有流亡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一系的人物回國以後凌空了，在韓國似乎沒有所謂的基地，內部也一再起着分化。被人民目爲保守份子的獨立黨，既不能容納於北韓政權，也不能在南韓得勢。金九、金奎植、趙素昂他們回國以後，一直在苦悶着——南廳不收北廟不留。說句洩氣而教中國人不喜歡聽的話吧，誰教他們曾經依舊過不爭氣的中國呢？中國勝利接收沿海及東北華北各城市，在敵偽產業處理中，更使得被迫回國的韓僑，抱着一大肚子的冤枉，有的竟至於對留韓的華僑尋報復。即使金九他根據多年中韓的歷史關係，願意傾向中國，他也沒有方法洗淨那些從中國同去的韓僑的不愉快的心情。而且中國連年內戰，也給兄弟之邦的韓國一個很壞的印象。早就有人想將來韓國是否也要追蹤中國來發動內戰？

金、李兩姓都是朝鮮的大族。北韓是金日成、金斗鳳（中國人有時把「斗」誤寫爲「科」）的勢力，而金九、金奎植所主張的統一路線，在現階段的政治主張上也與北韓年託治之議，這一切都違背了朝鮮人民的意志。現在託治時期已將滿，而朝鮮獨立統一的希望還相當的渺茫。美國，還有一部人去蘇聯。現在日本打倒了，在開羅會議中本已有使朝鮮獨立的諾言。後經波茨坦會議及戰後莫斯科會議，始則有三八度南北分割之決定，後又有所謂五年託治之議，這一切都違背了朝鮮人民的意志。現在託治時期已將滿，而朝鮮獨立統一的希望還相當的渺茫。

在中國有位反對軍事統一的李承晚，現在美國還抵祖國，這是目前朝鮮政治舞台上的三系勢力。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以前，中日俄三國曾角逐過朝鮮，現在美國代替了過去日本的位置。李承晚一系的人物和美國在韓國領導下的一些基督徒，無疑地傾向美國。還有過去依附

他們的招牌下，似乎復活了李氏王朝。在漢城有位反對軍事統一的李承晚，現在美國還抵祖國，這是目前朝鮮政治舞台上的三系勢力。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以前，中日俄三國曾角逐過朝鮮，現在美國代替了過去日本的位置。李承晚一系的人物和美國在韓國領導下的一些基督徒，無疑地傾向美國。還有過去依附

國這個名詞，他們認為韓國一詞來自中日戰後，承認韓國獨立而事實上走入日本兼併的路途。他們常憤怒的說：「朝鮮就是朝鮮，用不到叫做韓國。」於是主張用朝鮮者，一切冠以朝鮮，主張用韓國者一切冠以韓國。從這一點之差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兩個民主黨創出的本質上是不同的。不過現在南韓的朝民黨已經失去了他獨立的立場，李允榮一直與韓民黨勾搭着，甚至於辦公地方都住在漢城的世宗路一三九號。朝民黨已經成為韓民黨的附屬關係而成為無任所的閣員了。

七十三歲的李承晚與韓國民主黨的關係也是值得談的。韓民黨是南韓政府中的第一大黨，他的組成份子是財閥地主與日帝合作的走狗份子，先天具有濃厚的落伍性，與「民主」之名不甚調和，實在是新瓶裝舊酒。李承晚並不是韓民黨成員，他在盟國勝利後自美返國，成了韓國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關於他的歷史經歷似乎用不道多作介紹了。他在國內並沒有社會基礎，到漢城後根據美國扶植保守勢力的決策，所以不得不與南韓第一大黨密切勾結。因為在南韓二百名議員中，韓民黨佔有六十席，另外還有很多在政治路線上與韓民黨完全相同的議員，因為韓民黨聲譽太臭，所以不敢直接聲稱自己是韓民黨，而掛着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招牌與韓民黨合作。這樣議會中的民主議院，李爲議長，金爲經理，並宣佈臨時政綱二十七條。另一個也是更重要的組織是同年二月八日創立的大韓獨立促進會，也是由李、金分任總裁副總裁。後來這兩位獨立運動者的老人，因爲主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了。主張單獨成立政府者與韓民黨合作，已經升入總統的寶座。主張成立統一政府者參加平壤會議以後，又返回了漢城，仍然在致力他的統一工作。

韓民黨與李承晚雖然互相利用，但是李爲避免無黨派人士的反對，却也不敢提名叫金性洙組閣。首提李允榮被否決，以後又提了李範奭。「混合內閣」的形式，恐怕早已經是李承晚自己擬定好了的腹稿。不如此不能拉攏各黨各派，也難以在內閣中塞進他自己的人去。

李範奭出在南韓首屆內閣，也算是出於冷門。論地位與資歷，他還差的很多，不過有一個地位較高的內閣，李承晚指揮倒也靈活。同時因閱歷的資望較低，閣員的資望也就等而下之了。例如軍政廳的警務部長沒有湊到外交部长，而他的部下首都警察廳長副做了外交部長。多少有地

位的人，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

金佐鎮組織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物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二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奎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登陸部隊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

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鎮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打。即使座中無妓，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妓？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擺軍備戰了。

外交部長張澤相是留過美的，他在出任外長之前是首都警察廳長，指揮着日本時代的警察和特務，對於鎮壓羣衆運動盡了很大的努力，多少人從他手裏入獄，多少人被打。即使座中無妓，誰又能担保他不是心中有妓？何況國內有南北分裂的現實，國際有美蘇對立的鐵證呢？我們的內閣於是只有擺軍備戰了。

農業部長曹奉岩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韓勞動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以出任農業部長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允榮分別代表着韓民黨與朝民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利緩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韓各部長是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乎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絕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示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尹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李內閣的三位閣員，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物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二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奎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登陸部隊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

農業部長曹奉岩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韓勞動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以出任農業部長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允榮分別代表着韓民黨與朝民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利緩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韓各部長是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乎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絕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示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尹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李內閣的三位閣員，都沒有納入這個首屆內閣之中。李內閣的特點除了一般的資望較低以外，就是閣員中多半都沒有直接參加過獨立運動，而且沒有一個部長是平民出身的。無任所的閣員金性洙倒是李內閣的一個大台柱。現在讓我們把李內閣做一個分析和介紹。

閣員中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有無黨派的外交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總理兼國防部長李範奭是個軍人，二十歲的時候隨他的姊丈申錫雨去中國，畢業雲南講武堂，在中國居留近二十年，也兩次去過蘇聯。「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滿洲隨金佐鎮組織義勇軍，金與李都是右派思想的人物，後來金佐鎮被左翼的金日成一派人物刺殺了，因此他們有血仇。據說美國知道這段歷史，他出任內閣後，不會與北韓合作。李範奭在光復軍做過參謀長和第二支隊司令，地位與金若山金奎奎相等，同在現任無任所閣員的李青天之下，所以他的地位是不高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他就與美軍方面有接觸，參與美軍太平洋總部日本登陸部隊有關朝鮮的計劃工作。因此他回國後，組織以光復軍爲基幹的半軍事性質的青年團，獨能獲得美方的援助。從這些關係上看，可以知道首屆內閣將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準備南北戰爭的內閣。怪不得李氏組閣後，對人表示內戰無法避免。

農業部長曹奉岩是個比較奇特的人物，他是參加過政黨組織的，他與朴憲永同屬於許憲的南韓勞動黨，而且原來就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被日本人拘押過。託治問題發生，朴憲永他們表示贊成託治，曹獨表示反對，因此被開除黨籍，雖然如此，他還向人表示並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惟反對託治。直到出任部長以前他是有過長時期的沉默的，這次爲什麼能以出任農業部長是一個謎。

此外關於無任所的閣員三人，金性洙李允榮分別代表着韓民黨與朝民黨，李青天原是臨時政府之一員，與金九金奎植比接近的，李任無任所閣員可以利緩獨立黨的反對。而且他與李範奭有舊的部屬關係，回國後兩李分別組織大同青年團及民族青年團，李老將軍不但在光復軍中有其最高地位，大同青年團的團員比民族青年團人數還多。三個無任所閣員的地位與資望比韓各部長是還高一些。

總之，這個首屆混合內閣是難乎衆望的，以這個內閣作基礎絕難達成獨立統一，南韓李氏王朝是在走着分裂之路，因爲只有分裂才可以維持特權，只有分裂二三流的人物才可以出任部長，也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任閣員，李承晚才可以指揮裕如。李範奭表面上示忘情中國，骨子裏是美國馬首是瞻，而中國首先臨時承認了這個政府，這是韓國人民所不能瞭解的。中國多少年來培植的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寂寞的住在京橋莊，金奎植住在三清洞，他們還在工廠中並不做工，用流氓的手段來強迫工人入盟，並打擊相，婦女國民黨的商務部長尹永信，內政部長尹致暉，財政部長金度演，司法部長李仁。

德國問題的癥結

Real Issue in Germany.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uly 17, 1948

英美的政客們依舊在用「毋忘慕尼黑」來號召，如果除了戰爭祇有屈服時，要我們勇敢迎戰。但是一般人民却不容易地回到一九三八年的情緒。戰爭結束還祇有三年，我們還沒有準備接受另一次更可怕，也更不像會「挽救民主」的戰爭。人民不願接受這種火藥味的論調，一部分的理由是在他們拒絕把蘇聯和納粹德國引為一談，把新聞題看作老問題，他們看不出對德國資產階級制橫的爭執和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民主的爭執有什麼相似之處。

當前盛行的那種禍天由命的情緒還有它較深的原因。至少在英國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年夏天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是兩個非歐洲人在殘破的歐洲土地上的所為，這戰爭的初期將是紅軍的西進，不但佔領柏林，佔領德國，而且將佔領大部分的西歐。普通人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局面中談戰爭是虎頭人的，不能認真的，糾紛還是得和解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這種信念是正確的。除非雙方同時在外交上搞大舞，戰爭不致發生。

但是這並不是說面前的僵局是容易打開的。德國問題，是實際利益衝突的結果，柏林危機不過是雙方選擇出來宣傳的引爆點了。三年以來這個基本的衝突已經被種種次要的政見所籠罩得被人遺忘了。在我們決定柏林對策之前，把這基本趨勢提醒一下大概是有益的。

要這樣做，我們得到波茨坦協定之前，記起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情形。在那個時候，英美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兩件事。第一是要拉住蘇聯在戰爭中，防止蘇德的單獨媾和。正確也罷，錯誤也罷——大概是錯誤的——邱吉爾和羅斯福很怕蘇德的和議。在德黑蘭和雅爾達兩次會議中，他們預備作很大的讓步去討好史大林，用以得到他在西方強國爭鬥熱潮中，德國人，尤其是柏林人，已被認為具有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勇氣的美德了，但是在三年前沒有人這樣想法。我們可以記起在魁北克，邱吉爾和羅斯福會接受摩根索的方案。（這是一個嚴厲的解除德國經濟能力的方案。）那個時候，德國經濟因大量實物賄賂所可能引起的危機並未受到關心，關心的是德國復興的可能。蘇聯在蘇聯的那樣的運機器，當時不但沒有增加蘇美的距離，反而很得美國的歡心。英國各黨都認為蘇聯對德的威脅是錯的，他們歡迎艾森豪威爾在白河畔，不進攻柏林。

那是被逼出此的，把雙方爭執坦白說明了，很清楚的，柏林問題並不能

孤獨地以解決。西方國家固然缺乏遠見，沒有得到交通線的確切保障，在法理上說，他們是有權住在柏林的，但是四歐政府是否順序而破壞四強協定，這協定却是佔領柏林的根據。如果西方國家決定要把三個佔領區合成西德國家的東部佔領區包括柏林是同樣合理的，可以一樣處理呢？

蘇聯也可以合理的責問，新嘉士的發行和在佛朗福脫離蘇聯也沒有成爲利我們在歐洲的希望有關的問題前，我們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不合作的抗議；我們可以自動的在佛朗福脫離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方法。

——而且要蘇聯作一個危險的決定。讓我們留在柏林，同時又讓我們建立西德政府，他們將在世界面前表示對威力的屈服。如果我們覺得放棄柏林有損面子，從蘇聯方面說，讓我們留在柏林和同時建立西德政府將更有損面子的。

——而我方爲了面子都不能讓步了。

柏林危機却帶來了一個有利的轉機。它表明了西德政府在實際上是行不通了。幾個月之前也許還有此可能，現在沒有一個德國政治上的人物願意接受這個辦法了，因為在現在的局面下接納這辦法等於否認蘇聯的分裂。

國家不顧一切的要維持他們在柏林的地位，實際上却犧牲了倫敦的六強協定。

美國的政論家李普曼瞭解了這個情形，所以寫了很长

的文章，主張重開外長會議，再度試求全盤德國問題的和平解決。李普曼一直是反對組織西德政府的，他覺得柏林危機是從不可守的據點撤退的良機。在華沙文告中東歐集團再建議佔領德國的四國盟軍提早撤退，建立一個有足夠保證的統一的德國。李普曼認爲這個建議應當接受，至

少也應當看他們有無誠意。

李普曼的看法是值得支持的。如果蘇聯提出了建設性

的和平建議而我們拒絕討論，西方國家的地位是難堪的，所以我們不能讓蘇聯使我們走到這地步上去。即使外長會議不能解決蘇聯和疆界問題，至少也可以有一個過渡辦法

好像協議一個大家在他佔領區裏遵守的施政綱領。重開談判是不會有損失的，不願協商則將蒙受一切的不利。

（觀察特約記者譯）

林（那時他很可能可以這樣做），一部原因是他們相信蘇聯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徹底。就是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這種見解還是很盛行。英德禮不受史密茲將軍的警告，姑息當時是否應支持捷克民主的爭執有什麼相似之處。

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覺得

國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在戰時和戰爭剛結束時，我們不住的警告過分的見解。

到了摩根索方案將創造一個真空的德國，而這個方案有

心理，而且預言接看會逆轉而成惡德的情緒。當該時人看

到蘇聯有異於一九四八年的蘇聯，而是因為英美當時覺得

國問題的解決祇有用蘇聯的觀點去反抗德國復興的危險。

蘇聯還沒有成爲利我們在歐洲的希望有關的問題前，我們可以決定從柏林撤退，作我們對蘇聯不合作的抗議；

我們可以自動的在佛朗福脫離建立一個德國的京都。這種做

法是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相反的，我們一方面留在柏林，一方面又建立西德政府。

我們又向柏林人民許下神聖的諾言：一定要保護並且接

濟他們。這個政策不但接受了個技術上近於不可能實行的

方法。

——而且要蘇聯作一個危險的決定。讓我們留在柏林，同

時又讓我們建立西德政府，他們將在世界面前表示對威力

的屈服。如果我們覺得放棄柏林有損面子，從蘇聯方面說，

讓我們留在柏林和同時建立西德政府將更有損面子的。

——而我方爲了面子都不能讓步了。

柏林危機却帶來了一個有利的轉機。它表明了西德政

府在實際上是行不通了。幾個月之前也許還有此可能，

現在沒有一個德國政治上的人物願意接受這個辦法了，因

為在現在的局面下接納這辦法等於否認蘇聯的分裂。

國家不顧一切的要維持他們在柏林的地位，實際上却犧

牲了倫敦的六強協定。

美國的政論家李普曼瞭解了這個情形，所以寫了很长

的文章，主張重開外長會議，再度試求全盤德國問題的和平

解決。李普曼一直是反對組織西德政府的，他覺得柏林

危機是從不可守的據點撤退的良機。在華沙文告中東歐集

團再建議佔領德國的四國盟軍提早撤退，建立一個有足

夠保證的統一的德國。李普曼認爲這個建議應當接受，至

少也應當看他們有無誠意。

李普曼的看法是值得支持的。如果蘇聯提出了建設性

的和平建議而我們拒絕討論，西方國家的地位是難堪的，

所以我們不能讓蘇聯使我們走到這地步上去。即使外長會

議不能解決蘇聯和疆界問題，至少也可以有一個過渡辦法

好像協議一個大家在他佔領區裏遵守的施政綱領。重開談

判是不會有損失的，不願協商則將蒙受一切的不利。

（觀察特約記者譯）

悼朱佩弦先生

吳 脍

佩弦先生的死，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前途，中國文化學術界，都是無比的損失。我和佩弦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在師友之間。二十年前我進清華讀書時，他已在清華當教授，雖然系別不同，沒有聽過他的課，因為他是清華學報的編輯人，我常寫論文在學報發表，因之也就認識了，一直到现在為止，他在文字上口頭上叫我原名春晗的少數前輩中間的一個。

學校南遷以後，幾千人擠在一個小城子裏，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北平多了，生活上比較接近，彼此間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多。復校以後，爲了編輯聞一多先生遺著，經常有問題要商量解決，不但常見面，也時常通信。不料一多全集正要出版，他已經不及見，繼而友去了！兩年內統計有他的二十多封信，都是關於一多全集的，幾年來的習慣，不保存存朋友信札，這些書簡也沒有例外，更以爲承教之日方長，又誰能料到，誰能忍心料到會有這一天？到今天追悔也無法補救了！

整飭、愼謹、週到、溫和、寬容、高度正義感，加上隨時隨地追求進步，這些德性的綜合，構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和一多相反，在性格上，他屬於溫文爾雅一類的典型，從來不會放言高論，聲震屋瓦，也不會慷慨激昂，使人興奮共鳴。無論是私人談話或是公開演講，總是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文如其人，文字上的表現是細膩、穩到、平氣和。拿酒來譬喻，一多是烈性的，佩弦先生是連年陳紹，可口而力量大。

任何季節，衣服雖破爛，總是很整齊，終席無惰容。因爲多病，服裝的季節性要比一般人提早，去年十一月有一次去看他，穿着大棉袍，脚下一雙大毛靴。今年七月十五日晚上，聞一多紀念會，他出席講演，這晚上極熱，我們脫去上衣，只有他，一直到終場，沒有脫衣服，也似乎不很出汗。

處世作事，小心謹慎，從來不會得罪過人，當然，更不會阿諛。教了幾十年書，總是那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作一件事，事先考慮周詳，不輕於允諾，也決不翻悔，改變主意。誠實、坦白，是非非，表裏如一。幾年來，在昆明，在北平，朋友們經常對國事發表意見

，徵求他簽署時，大部份是毫不猶疑的，譬如北平十三教授的人權宣言，就是他領銜發出的。最近拒絕接受美援的宣言，也有他的名字。提到這件事，應該鄭重指出，在另一篇悼文中，我曾經這樣寫，臨終前兩天：

有人說，他告訴太太：「有一件事千萬別忘記，我是簽字在拒絕接受美國經濟物資宣言的人。」以後便沒有說過話了，這句話是他唯一的遺囑。今天晚上，有當時目擊耳聞的人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在有的場合，他會告訴你：「請原諒我，也許是年歲太大的關係，太刻激的文字於我不適宜。你們要鬥爭是可敬的，不過，我得慢慢的來」。用充分的同情送出的大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他出席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他除了指出知識份子有兩種，一種是朝上爬的，幫凶幫閑的，一種是向下的，爲人民服務的。並且坦白地承認：「要許多知識份子每人都丟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

事實上，幾年來他確實是在向青年學習，他出席每一次學生所主持的文藝座談會，討論李有材板話，趙家莊的變遷，王貴和李香香，提出極精到的意見。他發表「標準與尺度」一文，指出今天文學的道路。在同樣的場合，領導朗誦詩，親自參加集體朗誦。並且，還參加本系師生新一年同樂會，化裝扭秧歌。朗誦詩和扭秧歌在青年人也許是家常便飯，但是，一個五十歲的老教授，一個學系的主持人，意義就不同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並肩，走得並不慢。

七月十五日，他出席四個會，其中一個似乎是交代系務，因爲他下學年休假了。第一個會是聞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報告了遺著整理和出版的經過，以及有關事項的處理決定後，宣告這個會的解散。（這些情形我是親身參加，知道得明明白白的。過幾天清華校刊登出這會的紀錄，上午代國文系主任浦江清先生寄一份校刊給我，到下午又收到同樣一份，封面上寫着朱寄。）第四個會是晚上的「多紀念會」。過幾天他就病了，二十三日那個會，勉強扶杖出席，沒有吃飯就走了。

爲了一多的著作，這兩年內化去了他大部份的時間，

沒有他，這部書是編不成，出不了版的。大約在一個半月前，校內一個途別休假同學的宴會，生在抱怨學了許多×××之類的科目，對今天的局面瞭解一無裨益。甚至有些課是專門應付教育部命令的，從不上課，教授官僚化，學系變成衙門。他感慨地說，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多，不能談。不過，也不是絕對沒辦法，比如國文系，他主張着重現代和近代，從後向前推，這樣，學生縱然不知古，至少也可以道今，不枉作一個現代人。

國文系的同人和學生對佩弦先生的看法，同人認爲是最好的同事，最理想的系主任，系中大小事務，從聘請教授到指導學生研究，都召開系務會議決定，議案通過以後，執行的情況，或者稍有變通的地方，他照例一個個分別用書面或口頭通知。平時有一定的時間在系辦公室處理系務，選購圖書。學生感激他上課時候的認真，更喜歡他在課堂以外的講演和指導，他和同學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一起玩，是可敬的師長，是親愛的父兄，是民主的學者。

害胃病多年了，尤其是對日戰爭這幾年，家眷住在成都，單身在宿舍吃包飯，陳倉爛米，加上種子沙粒，營養談不到，健康一天天被侵蝕。回到北平以後，還是過的苦日子，成天要爲柴米油鹽發愁，講務系務以外，用全時間來寫作，過度的工作更損壞了體力，單是這半年，就犯了三次嚴重的胃病，進醫院以前的體重只有三十五公斤。胃潰瘍，十二指腸也壞了，割治後轉成腎臟炎，又變成肺炎，終於不治。

一年前，有一天他告訴我，第二個孩子在南京作事的，寄了五十萬元來，心裏很難過。在醫生說必需立刻進醫院割治以後，爲了借錢，到處找人，就誤了一個半鐘頭。其實，要在十年前，他一定不會拖到這樣嚴重的情況，早就進醫院割治了。我敢相信，假使他生在一個和平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或者早生、晚生二十年，他不會死，至少還可以再爲人民工作二十年。

然而，他恰恰生在這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激烈內戰時代，既不要文化也不要學者的時代，他營養不良，他過度工作，他久病，他死了！

最後，應該說明的，雖然在黨派教育的大帽子下，建校的行政人員都有不能免於黨籍的自由，佩弦先生似乎沒有成爲黨員。另一面，雖然提倡朗誦詩，贊揚趙衡理，甚至化裝扭秧歌，這些行動在今天都是可以構成送到特種刑庭的罪狀的，佩弦先生的朋友也可以用直覺來保證他決非另一黨的黨員。他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朋友。

八月十六日晚於清華園

